



建黨90年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探索建立市場經濟

中共靠集體智慧深化改革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立市場經濟不僅是一場偉大的實踐，更是一項嶄新而艱巨的事業。內地專家認為，縱觀歷史，每逢挑戰，中共總能凝聚集體智慧，迅速適應局面變化，做出果斷決定並高效率地貫徹實施。中共一貫的從實際情況出發和靈活開放的執政風格將助其再克難關。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9日報道，今年56歲的陳國蘭，至今仍收藏着數十種、幾百張票證。在經歷過計劃經濟年代的記憶中，票證是與物資極度匱乏的艱難歲月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由於物資短缺，中國當時實施了商品統購統銷的政策，購買商品都要出具相應票證，「排隊購買」和「憑票供應」成為那個時代的鮮明烙印。

破除教條推動市場經濟

中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起到積極作用，但隨着時代發展，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政企職責不分、分配中嚴重的平均主義等問題，導致當時中國工業總體效率低下，產業結構失衡，糧食產量增長緩慢，人民生活水準徘徊不前。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中國探索發展市場經濟從此一錘定音。分析人士指出，這項大政方針的提出和實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求真務實、大膽創新的領導智慧。

根據傳統教條，市場經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形式，與社會主義是根本對立的，連談論它都是禁區。然而，鄧小平在視察南方講話中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論斷為進一步推動中國改革開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利用，中國共產黨的嘗試是一個學習和探索過程，由早期吸收引進國外經驗到結合自身實際、自主創新，通過不斷改革和完善，開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和自身發展的道路。」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丁元竹說。

丁元竹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政府與市場對經濟的共同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可以抑制市場行為中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避免市場趨利造成的調節失靈。「這一特點幫助中國經濟渡過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下大決心實現更大轉變

「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非常成功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說。他指出，中國以往的改革採取了自下而上、由易到難的路徑，現已進入改革攻堅期，隨着改革難度的加大，一些基層缺乏改革動力，一些需要改革的領域如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稅收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機制改革等都必須通過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推行才能解決。張立群坦言他最擔憂的是中國未來能否成功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如果中國不能實現這一轉變，未來發展將逐漸減速，社會矛盾可能激化，發展的空間將變小。」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院研究員常修澤認為，中國經過30年的探索，傳統體制的弊端及其改革路徑，已經「摸」得大體清楚。中共提出在今後五年以更大「決心和勇氣」來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做好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反映了改革的縱深化和制度化趨勢。

《黨史細節》摘編之四

中山艦事件因蔣多疑引發

大革命時期影響國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悍然下令佔領中山艦，逮捕時任海軍局代局長和中山艦艦長的李之龍（中共黨員，海軍中將）。通常認為這是蔣向共產黨挑釁的一次陰謀。《黨史細節》一書指出，這或許是由於中山艦臨時調動引發的一場誤會。敏感而多疑的蔣介石，誤以為汪精衛和蘇聯顧問季山嘉試圖把他劫持到中山艦上，送往蘇聯。不過十幾個小時之後，當蔣意識到這完全是自己的主觀猜忌後，他就下令交還收繳的武器，並放回被軟禁的黨代表，重新恢復常態。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到反目成仇這一段歷史中，共產國際扮演了異常重要的角色。

●國共合作最早是出自馬林的建議，然而孫中山一開始並不積極，半年裡也無多大動靜

中共一大後不久，1921年年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晤見了孫中山，與孫中山長談了三次，與其他的國民黨要人也有所接觸。桂林之行，使馬林對孫中山和國民黨留下很好的印象，也使他相信，中國革命最好的形式，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合作。

然而，孫中山對於馬林的建議並不十分積極。他直截了當地對陪同馬林並擔任翻譯的張太雷說：「為什麼青年要從馬克思那裡尋求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他認為，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些年輕人崇洋媚外和標新立異的表現。加之孫中山此時正充滿信心地準備新一輪北伐，而此次北伐所依靠的力量，是



▲孫中山、宋慶齡與「永豐艦」官兵合影。孫中山逝世後「永豐艦」改名為「中山艦」

他一手培養起來的陳炯明，他認為北伐成功的可能性極大，故對國共合作之事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所以馬林結束桂林之行後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裡，國共合作之事並無多大動靜。（摘自《黨史細節》P38—P39）

●為取方寶劍，馬林繞道荷蘭回莫斯科，結果請來了印在絲質襯衣上的「八月指示」

1922年4月，馬林得知陳獨秀背着自已給維金斯基寫信反對與國民黨合作後，為了取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使陳獨秀放棄已見，於月底繞道荷蘭回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匯報了中國情況，並且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明確支持。維金斯基隨即向中國共產黨發出如下指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短箋後，應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非力普同志（按：即馬林——引者）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

維金斯基簽發的這份指示，實際上也巧妙地給陳獨秀4月來信做了答覆。

西柏坡紀念館外樹立着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的塑像
王德軍攝



《黨史》三卷撰寫已啟動

專家談評價毛澤東：功績第一位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九日電】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9日介紹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最新進展。在回答有關近期民間就如何評價毛澤東所產生的爭議時，李忠傑表示應當實事求是、科學、全面的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從毛澤東一生來看，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中共未迴避毛澤東晚年錯誤

「客觀地說，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晚年也犯了錯誤，造成了重要的損失，對此我們黨並沒有迴避，對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深刻認真的分析。」他指出，毛澤東領導中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也實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了毛澤東所犯錯誤並吸取教訓。因此，改革開放之後，繼續進行自己的探索，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對毛澤東同志，我覺得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全面的態度」。

李忠傑介紹，中央黨史研究室及全國黨史部

門進一步深化黨史研究，推出了《黨史》二卷，並校訂重印了《黨史》一卷，兩卷黨史的發行總量目前已超185萬冊。記錄1978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黨史》三卷，目前也已開始收集資料，並提出初步框架，對專題問題開展深入研究。

《黨史》二卷中包括了反右、大躍進、文革等黨史上富有爭議的歷史階段，李忠傑表示，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迴避，「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是在沒有經驗，在非常複雜的情況下進行的。在這個過程當中，要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就免不了要有一些曲折、失誤，我們黨始終是正確的認識和對待這樣一些東西，嚴肅的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當有美國記者問及中共是否願意繼續執政九十年時，李忠傑笑言，「世界上沒有哪個政黨不想執政，或者執政後希望自已早一點下台的，作為政黨都希望不斷的執政下去。問題在於客觀上你執政的怎麼樣？效果怎麼樣？人民歡不歡迎？執政的結果是把國家搞糟了還是搞好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建設成今天這樣，世界上很多國家、很多政黨都非常羨慕，為什麼不繼續執政下去？」

90特稿

西柏坡迎來「朝聖熱」

本報記者 王德軍

隨着中共建黨90周年紀念日的到來，河北西柏坡紅色旅遊也不斷升溫。西柏坡紀念館副館長陳宗良今天在接見港澳媒體聯合採訪時表示，預計今年將接待遊客450萬人次，比去年增加100多萬人。

此外，西柏坡已入選國家首批5A級紅色旅遊景點，未來三到五年，大西柏坡規劃目標提出，要使年遊客人數增加到1000萬人次，旅遊年收入超過100億元。

河北平山西柏坡是中國五大紅色聖地之一。1948年5月，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移駐於此，使這個小山村成為「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2002年十六大以後，胡錦濤在第二年考察西柏坡，這是他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的首次重要考察活動。胡錦濤在西柏坡告誡全黨牢記毛澤東當年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從自身做起，並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目標和任務開拓進取、團結奮鬥。

此後，包括吳邦國、溫家寶、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周永康等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訪西柏坡。隨着近年來中國「唱紅歌」活動熱潮的掀起，西柏坡的遊客數量也從本世紀初的數十萬人驟增到去年的360多萬人。

2010年4月，河北省提出建設「大西柏坡」戰略目標。據了解，僅端午三天假期，西柏坡紀念館就接待遊客近9萬人次。而且同往年相比，今年廣東、浙江、上海等地的團隊明顯增加，隨着「七·一」來臨，遊客人數將達到新高峰。在紀念館和中共中央辦公舊址，遊客認真聽取講解員的講解，重溫革命戰爭年代的紅色激情，還有遊人身穿八路軍、解放軍軍服留影紀念。

據國務院港澳辦介紹，在中共建黨90周年來臨之際，香港澳門地區駐京的17家媒體相繼提出紅色之旅的採訪申請，港澳辦應駐京記者要求，組織走進革命聖地西柏坡和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等參觀採訪活動。

【本報河北西柏坡九日電】

- 一、改組武漢國民政府，加強這個政府中中共黨的領導力量；
- 二、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增加更多的工農領袖；
- 三、武裝二萬中共黨員；
- 四、挑選五萬工農積極分子加入國民黨軍隊，使國民黨軍隊得以徹底改造，排除其中的反動將領，以中共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代替；
- 五、建立以國民黨左派領袖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嚴厲懲辦反動軍官；
- 六、厲行土地革命，堅決從下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和豪紳的財產。

6月1日，羅易在末同任何人商量的情況下，將汪精衛約至其寓所，然後出示共產國際的密電給汪看。羅易這樣做，無非是讓汪精衛接受這個電報，同他一起搞土地革命。事後汪精衛對此事做了如下描述：

6月1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和鮑羅庭的，鮑羅庭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的。兄弟看過之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些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為已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

羅易以為這樣汪精衛會按照他設想的路去走，殊不知，這正好為汪精衛集團分共提供了口實。（摘自《黨史細節》P75—P76）

（經人民出版社和《黨史細節》作者羅平漢授權刊登）

